

切实筑牢国家非传统安全防线

■于森 王晓彬

开栏的话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范围内大流行,给经济社会发展和人们正常生活造成严重威胁,也让非传统安全的话题再次进入人们视野。相较于传统安全而言,非传统安全有哪些特点,哪些领域的安全威胁比较突出,会如何传导和影响到传统安全,该怎样防范非传统安全威胁等?为解答这一系列问题,回应读者关切,引导广大官兵强化国家安全意识,本报特推出“关注非传统安全威胁”系列文章,以飨读者。

冷战结束以后,国际社会逐步形成共识,即传统安全威胁逐步下降,非传统安全威胁上升,特别是恐怖主义、金融危机、气候变化、重大自然灾害、跨国犯罪、重大疫情等全球性问题越来越成为世界人民面临的共同威胁。面对日新月异的非传统安全威胁,我们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贯彻落实国家安全战略纲要,主动作为,前瞻谋划,筑牢国家非传统安全防线。

把握新时代国家安全需求,科学认识非传统安全的鲜明特征

新时代,国家安全的内涵外延、时空领域、内外因素都在发生深刻变化,安全需求的综合性、全域性、外向性特征更加突出。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深化了我们对非传统安全的认识,表明非传统安全正在发生历史性嬗变,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

从历史演变到发展趋势的“一条主线”看,非传统安全威胁日趋多发频发,危害性和复杂性不断增强,已成为国家安全的常态化风险。重大自然灾害、恐怖主义、跨国犯罪、重大疫情等非传统安全威胁,具有灾害种类多、分布地域广、发生频率高、造成损失重等特点。据统计,全球每年发生的自然灾害达到500次以上,造成数千亿美元损失。进入21世纪以来,“9·11”事件、“非典”疫情、印度洋大海啸、国际金融危机等灾祸接连不断,给人类社会造成惨重损失。据世界卫生组织每日疫情报告显示,截至北京时间4月19日16时,全球新冠病毒确诊病例超过224万、死亡病例超过15万,造成的经济损失难以估量。这充分说明,非传统安全威胁对国家安全的挑战日趋严峻,在国家安全体系中的地位日益上升,在国家安全频谱中越来越处在显要的位置。

从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看,非传统安全威胁已超越国界,扩散性和蔓延性日趋增强,成为人类社会的共同敌人。病毒没有国界,非传统安全风险是人类

面临的共同挑战,没有谁能够置身事外。一个国家和重大疫情之间,也许只隔着一架航班的距离。面对重大疫情等非传统安全威胁,各国难以独善其身,世界没有安全孤岛。现实表明,重大疫情等非传统安全威胁往往引发区域性或国际性影响,超越地域和国界的限制,不分种族、宗教或文化背景,同时影响国内安全和国际安全。国内外安全风险的相互传递、交互震荡,已成为影响国家安全的重要问题。合作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已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

从非传统安全和传统安全的“演化机制”看,非传统安全威胁与传统安全威胁交织互动,连锁性和传导性进一步增强,引发战争风险和军事危机的可能性不能排除。历史上,重大自然灾害、经济危机等非传统安全威胁往往冲击国际战略格局和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甚至导致战争和冲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全球危机,可能引发世界各地的冲突。非传统安全威胁处置不利,可能引发多种安全风险的叠加效应,不但会引发经济、金融、科技、能源、社会等非传统风险,而且有可能引发政治外交、意识形态、军事等方面的传统安全问题,甚至加剧大国地缘竞争和战略对抗。

立足国家安全战略全局,强化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战略筹划

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家由大向强发展的关键期也是国家安全的高风险期。面对复杂严峻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形势,我们应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牢固树立维护国家安全的全局意识,以全球视野思考和运筹国家安全,加强新时代国家安全整体设计,牢牢把握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主动权。

聚力增效是根本要求。非传统安全威胁影响深远,应对要求高,应加强集中统一领导,实施果断战略决策,全力加以应对。面对重大疫情等非传统安全突

事件,应树立全国一盘棋思想,充分发挥党统揽全局和协调各方的政治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上下同欲众志成城民心优势、团结自律自强不息的文化优势,有效凝聚全国人民的集体智慧和磅礴力量,努力打赢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人民战争。

专业应对是关键手段。非传统安全威胁形形色色,应对方法区别很大,没有包治百病的良方,应坚持专业应对和分类施治,针对不同种类的非传统安全威胁,采取针对性措施和精准方法。同时,应有效利用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增加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科技含量,用创新性和科学方法达到标本兼治的目的。

综合施策是重要途径。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涉及多元力量和多方资源,联动关系复杂,这就要求不能搞单打一,而应坚持综合施策、多管齐下,统筹协调政治、外交、经济、文化、法律、舆论宣传等综合手段,力争打好组合拳。注重统筹非传统安全威胁应对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构建军地有机协调、相互支撑、整体联动的长效机制,加强军事行动与国家政治外交行动的协调配合,形成各领域有效配合、齐抓共管的整体合力。

国际合作是客观需求。事实证明,在非传统安全威胁面前,人类是休戚与共、风雨同舟的命运共同体。应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充分利用国内国际多种资源,积极开展国际和地区合作,勾画安危与共同心圆,不断扩大朋友圈,构建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国际统一战线。积极与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开展密切协调合作,充分发挥联合国等国际多边平台的重要作用,及时分享数据和信息,开展联合技术攻关,采取联合一致行动,阻断非传统安全风险内外传导链条。

着眼构建一体化的国家战略体系,提升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战略能力

非传统安全威胁对国家战略能力提出现实考验,维护国家安全须有实质性力量和手段。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应针对国家战略体系存在的短板弱项,加强顶层设计和前瞻谋划,不断健全国家安全体制机制,全面构建一体化的国家

关注非传统安全威胁 1

改革大家谈

新的旅营体制下,从师团变成旅营,不能简单视为形式上的撤并降改,而是围绕“瘦身、提质、增效”的要求,使指挥更加有力、精准、快捷,使部队更加精干、机动、高效。对于新组建的旅营单位而言,适应新体制、履行新职能、担当新使命,着力提升旅营体制下工作质效,需重点解决好以下几方面问题。

解决好整体筹划问题。“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对于新成立的旅营单位而言,如何进一步释放新体制效能,发挥新编制功能,需要一个探索和磨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应处理好局部与全局、当前与长远的关系,切实在整体筹划上下功夫。一方面,立足全局进行筹划。把本单位置于军队建设全局进行思考设计,按照军委决策部署和上级指示要求,探索研究旅营体制下的工作方式、运转模式和建设样式,切实与军队发展的大形势、大背景跟上趟、踩上点,确保部队建设始终保持正确方向。另一方面,着眼长远进行筹划。围绕部队应承担的使命任务,确立长期、远大的奋斗目标,设计清晰、具体的建设模型,明确任务书、施工图和时间表。同时,注重总结部队长期积累的宝贵经验和优良传统,创建本单位的特色文化,把全体官兵进一步凝聚起来。

解决好自我定位问题。旅,既是小的师,也是大的团。改革后,旅营单位承担了以前师团两级的职能,“小机关带大部队”的特点比较明显,如果定位不清容易造成师的层次没达到、团的作风没体现。只有立足“师的任务、旅的架子、团的模式”的现状,准确把握好自我定位,才能在规范工作、理顺关系的基础上,与上对标对表无缝连接、对下督导指导有效衔接。一方面,要有师的“头脑”。观大势、谋全局的意识强,站位高,抓建设、谋发展的观念新、标准高,能够用科学的思维理念和思想方法指导工作实践,注重发现和破解部队倾向性问题,防止陷入事务主义。另一方面,要有团的“手脚”。弘扬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坚持工作下沉、重心下移,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领导机关要经常深入基层一线,坚持面对面指导、实打实帮促,注重了解具体情况,解决具体问题;开展工作不能满足于发文开会,应持续性搞好跟踪问效,常态化抓好末端落实。

解决好层级管理问题。在日常工作中,有的单位机关对基层不放心、不放手,指令过多、指导过细,既造成自身忙乱,又不利于调动下面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确保工作有序运行、部队有效运转,应厘清领导机关与基层单位的责任权限,坚持层级管理、按级负责。一方面,领导机关应简政放权。正确的领导和有力的指导,不等于事无巨细“替你想到”、事必躬亲“为你做到”。在可控情况下和一定范围内,完全可以把工作安排权、事项决策权和活动开展权交给基层,做到该简的简化、该放的放手,防止大包大揽、“一竿子捅到底”。按照《军队基层建设纲要》要求履行自主建设职责、发挥自主建设功能,进一步理清工作思路,搞好工作统筹、

答好「旅营体制」这道新考题

■周东滨

规范工作秩序。尤其是基层党组织应加强党组织建设,彰显党组织功能,充分发挥政治引领、思想引领、组织引领和行为引领作用,不断凝聚抓建的力量,增强抓建的效果。

解决好精准指导问题。旅营单位编制结构横宽纵短,建设类别多样各异,领导管理摊子大、建设发展矛盾多。工作指导下,只有精准施策,精准发力,才能确保各项工作和建设始终沿着正确轨道、保持稳健步伐。一方面是防“粗”。无论是部署、推动工作,还是检查、督促落实,都不能浮在面上、止于肤浅。确保精准施策不粗放,应在把握特点和遵循规律的基础上抓根本、求长效。比如,对于经常性工作,坚持高标准,进一步搞好规范细化;对于创新性工作,注重研究探索,进一步搞好推广固化。另一方面是防“偏”。干各项工作、搞各项建设,都要始终聚焦主责主业。确保精准发力不偏向,应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既要加强战斗力建设,切实把人力、物力和财力用在练兵备战上,防止用迎检标准、活标准取代打仗标准;又要注重内涵式发展,多在凝心聚力、凝神聚气上下功夫、做文章,防止出现硬碰硬多、抓软件少和抓有形多、抓无形的现象。

解决好层级管理问题。在日常工作中,有的单位机关对基层不放心、不放手,指令过多、指导过细,既造成自身忙乱,又不利于调动下面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确保工作有序运行、部队有效运转,应厘清领导机关与基层单位的责任权限,坚持层级管理、按级负责。一方面,领导机关应简政放权。正确的领导和有力的指导,不等于事无巨细“替你想到”、事必躬亲“为你做到”。在可控情况下和一定范围内,完全可以把工作安排权、事项决策权和活动开展权交给基层,做到该简的简化、该放的放手,防止大包大揽、“一竿子捅到底”。按照《军队基层建设纲要》要求履行自主建设职责、发挥自主建设功能,进一步理清工作思路,搞好工作统筹、

观点争鸣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和突破,各类无人作战系统应运而生,未来作战行动似乎越来越不需要人类“亲力亲为”。然而,2019年11月美国国防部《2050年机械战士:人机融合与国防部的未来》的报告,展示了其“超级战士”人机融合系统的投入、研发和应用计划。“超级战士”旨在通过感知增强、外骨骼、脑机接口、基因工程等技术手段,大幅提升士兵的感知力、运动力、思维力等能力。那么,在无人作战系统快速发展的当下,还需不需要人机融合系统这种“超级战士”呢?笔者认为“超级战士”之所以能够存在并不断发展,是基于它不可替代的作用,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几点:

“超级战士”能弥补无人作战系统的不足。作为一种人机融合系统,“超级战士”改变了传统意义上人与武器的关系,实现了“人的武器化”或“武器的类人化”,不仅进一步延伸了人类战斗能力,还填补了因无人作战系统短板而留下的“战力空白”。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虽迅猛发展,但仍难以克服大量无人作战系统通信距离短、抗干扰性能差、可靠性不足、权限和相互关系界定困难等弱点。例如,在密集特征环境下,智能自主探测系统的识别和跟踪能力极其有限,甚至无法达到人类眼球对目标的锁定水平;拥有先进民用机器人技术的日本,在福岛核泄漏后也不得不雇佣志愿者清理核废料。美军认为,未来战场可能是城市或地下城市环境,“超级战士”可凭借视觉增强、听觉增强、嗅觉增强等技术,更加灵敏地获取和共享复杂目标数据,再通过人一机、人一机双向信息交换达成认知共识,每

个“超级战士”都可以成为指挥、控制和通信节点,并在一定范围内对所配属的无人装备进行实时操控,达成真正的人机优势互补。另外,相较于构建无人作战系统协作机制,“超级战士”不需要太多时间和经济成本,就可在联合行动的国家间实现互联互通甚至互操作,实践的可行性更强。

“超级战士”有助于发挥人类智能优势。“莫拉维克悖论”阐释的现象表明,机器智能可在逻辑、推理、计算等方面超越人类,比如无人作战系统的数据处理速度、决策科学性、打击精确性等,但在不确定因素多、人文环境复杂、需要感性认知和理解的条件下,人类智能的想象力、创造力、灵感、直觉、责任感等则有不可替代的优势。这类能力难以被解释、描述和编辑成“机器语言”,因而无法通过数据挖掘、智能算法、机器学习等技术复制至无人作战系统中。“超级战士”可通过被放大的感知功能,倚重人类智能进行细节识别、道德判断和临机决断,更好地完成在复杂战场环境中的特种战、城市战、反恐战等任务。不仅如此,“超级战士”还能充分挖掘潜意识效能,甚至运用各类方式刺激大脑发挥更多“神奇”功能。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的“认知技术威胁告警系统”就是试图利用人脑预测威胁

的“直觉”潜力,对相关脑电波分析处理,增强情报获取和危机预警的能力。伴随脑科学、仿生学、认知学、神经学等科学的不断发展与应用,“超级战士”项目有望释放更多人类智能潜力,拓展实战应用功能。

“超级战士”更能适应非正规作战需要。进入21世纪,世界主要国家受到多种安全挑战,非正规作战行动频率增加、地位上升。如果缺乏相关能力,即使取得初期军事胜利,也有可能陷入美军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遇到的困境。因此,军队须具备有效应对恐怖主义、敌特侦察与煽动、暴乱等混合威胁及“灰色区域”冲突的能力,执行更多稳定、控制、重建以及战场外隐蔽性要求较高的复杂任务。与无人作战系统相比,“超级战士”更易于满足这些需求。首先,“超级战士”能够借助物理增强机械,秘密且迅速地移动到预定地点,还可佩戴便携式感知融合器,混杂于敌对人群等高压、高密度的嘈杂环境中,识别暴乱制造者和指挥人员,并将信息快捷共享给团队其他人。其次,听觉增强系统能够帮助在战场上的士兵过滤大量噪声,提高语音识别灵敏度,及时进行情报收集与通信。再次,依靠非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超级战士”可以用大脑指挥一定数目的无人机、无人战车和仿生

点评

机器人VS“钢铁侠”,谁更强

■侯永波

漫威电影经典人物“钢铁侠”,是一个典型的利用人体增强技术打造的“超级战士”。让他和普通机器人对决,胜负一目了然。当然,现有的技术还无法打造能够上天入地、刀枪不入的“钢铁侠”,但与机器人相比,“超级战士”本质上都是人,是一种通过各种技术增强了体力、智力、打击力、防护力的人。正如“莫拉维克悖论”指出的,机器很擅长模仿人的推理能力,而对于人的直觉和下意识的行为却很难模仿。在可预见的短时期内,包括机器人在内的无人作战系统很难具备人类的思维能力,即使人工智能发展到高级阶段,使得机器人拥有超过人类的智商水平,但它能否具备人类的情感和理性还很难说。

比较机器人和“钢铁侠”谁更强大,并不是现代版的“关公战秦琼”,是发展人工智能技术打造无人作战系统,还是发展人体增强技术打造“超级战士”,代表了两种不同方向。是偏重于前者还是青睐于后者,或是双管齐下,在考虑研发时间和经济成本的情况下,往哪个方向重点投入是值得研究的问题。至于选择的结果,自然会在未来战场见分晓。

原则等作战规则要求。因此,只要人类仍是凭借自身感官对周边环境进行认知,或者人工智能技术还不足以制造出可以全面超越人类的机器人,“超级战士”就有其不可取代的战场价值。

相关链接

人体增强技术。通常分为体能增强、大脑增强、记忆增强、视听增强四大类,包括机械外骨骼、脑机接口、视网膜植入、听觉增进装置,以及提高智力的神经性药物等技术。近年来,外军启动了一批聚合科技探索项目,包括代谢工程、外骨骼增强战士计划、脑机接口技术、生物医学状况监测项目、增强现实工程、持续性辅助计划等,旨在为士兵提供强大的生理和认知能力,以应对未来复杂战场的挑战。综合分析,未来“超级战士”将从体能、技能到智能,从体力、视力、听力到防护力、判断力、反应力、注意力等各个方面得到全面加强。当前,世界主要国家都在研发“超级战士”项目,比如俄罗斯的“未来战士”系统、美国的“陆地勇士”系统、德国的“未来步兵”系统、英国的“拳头”系统等。

“莫拉维克悖论”。由汉斯·莫拉维克等多位人工智能及机器人专家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一个理论。他们发现,人类独有的所谓“高级智慧”只需要很少的运算能力,例如国际象棋、逻辑推理和复杂数学问题,但是直觉、感知、运动等无意识的技能却需要极大的运算能力。莫拉维克曾如此阐释这一悖论:让电脑像人一样下棋相对容易,但是要让电脑像一岁小孩一样去感知和行动却是相当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